

我国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杨紫涵^{1*}, 周楠², 王思睿³

(1.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市, 300222; *通讯作者, 1804023107@qq.com)

摘要: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数字化时代民主政治实践的核心形态, 也是促进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路径。在对中国知网 2005-2024 年 191 篇相关文献的年度分布、学科期刊分布、高被引文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究其涉足领域, 发现学界聚焦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五大核心议题。价值内涵上, 技术赋能使网络参与重构政民关系, 成为协商民主与治理合法性的重要载体; 影响因素涉及微观个体感知、中观技术因素和宏观制度环境; 双重效应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 现存问题集中在技术、制度和参与主体上; 优化路径从政府、平台和公民三个层面来探讨。后续研究需紧跟数治化转型趋势, 可尝试从公民数字参与的制度规范化建构、智能技术工具创新及数字公民能力体系培育展开深入研究。

关键词: 公民; 网络参与; 公共政策制定; 文献综述

引言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乃是数字时代民主政治实践的重要创新, 也是达成公共决策科学化及合法化的关键路径, 这一发展趋势在中国互联网普及率的急剧提升中得到了充分证实, 据 2025 年 1 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中国互联网发展一直呈现持续迅猛的状况: 从 2015 年到 2024 年, 网民普及率从 50.3% 跃到了 78.6%, 累计人数达到 11.08 亿人。在此背景下,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性与成果同样呈现同步提高的态势, 以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相关意见征求过程为例, 网民建言数量跟上年比起来激增了 82%, 累计接收到超过 160 万条建言, 这一数据明显体现出公众参与度大幅提升, 更说明公共政策制定在政府广开言路以及公民普遍参与中收获了显著成效。随着《“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明确提出“深化网络问政与政策协同”, 公民网络参与更变成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抓手[1], 其核心价值是凭借技术赋能重新编排政策主体间的互动关系[2], 推动政策合法性从“程序合规”往“实质认同”演变。

然而, 伴随数字进程的迅猛发展, 公民网络参与在深度与效能上仍面临多重难题, 既有研究表明: 当前公民网络参与的过程呈现出“形式化”的表征, 网络公民参与“制度化”方面缺失, 多数案例中, 公民仅能采用留言、投票等方式参与到政策评估环节, 而在议程设定与方案构建阶段没有实质性赋权[3]; 参与主体呈现出“结构上的失衡”, 数字鸿沟让弱势群体的话语权缺失, 网络参与主体的分层现象极为突出, 网络民意极易被高学历、高收入群体操控[4]; 技术负作用的显现加剧了治理的风险, 诸如区块链的新兴技术能提升协商透明度, 但也有可能被拿来制造“虚假民意泡沫”[5]。这些问题皆暴露出公民网络参与从“工具应用”转向“价值嵌入”转型的深层困局。

当前, 学界虽已从制度设计[6]、技术赋能[7]、文化培育[8]等维度展开探讨, 但研究呈现碎片化特征, 缺乏对参与机制系统性、动态性的整合分析。基于此, 本文系统梳理了 2005-2024 年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研究脉络, 剖析价值嬗变、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有助于明晰该领域研究演进轨迹, 为全面把握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研究现状提供数据支撑, 同时为后续深入研究相关主题提供思路方向。

1 我国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研究文献的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对 2005-2024 年中国知网数据库 (CNKI) 中与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相关的期刊文献进行系统分析。以“公民网络参与”或“公众网络参与”以及“公共政策制定”或“政策制定”两两组合为主题检索词, 设置文献类别为全部期刊、检索条件为模糊匹配, 初筛获得 268 篇相关文献。经二次人工筛查, 剔除主题不符的文献后, 最终确定 191 篇为研究样本。进一步限定文献类别为核心期刊, 筛选出 30 篇核心论文。具体指标数据详见表 1。

表 1 相关文献指标分析

文献数	核心期刊数	总参考数	总被引数	总下载数	下载被引比
191	30	3419	2294	174114	0.01

为进一步揭示我国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研究制定的发展脉络, 再分别从研究文献年度分布、学术与期刊分布、高被引文献情况等方面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1.1 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

图 1 呈现的是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状况, 从历年发文数量上看, 总体呈先升后降的波动趋势,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起步阶段 (2005-2011 年)。2005 年发文量仅为 2 篇, 随后逐年递增, 2009 年增至 10 篇, 2011 年达到 24 篇, 这一时期网络技术发展促使公民网络参与逐步受到关注, 研究热度不断攀升。位于中间的是波动调整阶段 (2012-2018 年)。2012 年发文量回落至 17 篇, 2013 年回升至 19 篇, 2014 年又降至 12 篇, 此后在波动中演进, 2016 年为 16 篇, 2017—2018 年稳定在 13 篇, 显示出该领域研究受现实政策环境、技术发展程度及学术关注度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 处于调整优化但仍保持一定热度的状态。最后为持续下降阶段 (2019-2024 年)。2019 年发文量降至 5 篇, 随后逐年递减, 到 2024 年仅有 1 篇, 这表明该领域研究可能进入瓶颈期, 亟待新的理论视角、实践案例或技术变革来注入活力, 进而推动相关研究向更深层次或崭新方向拓展。



图 1 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

1.2 学科与期刊分布情况

按照检索规则, 梳理中国知网关于研究文献的学科分布, 得到文献数量在相应学科排名前 10 的基本情况 (如表 2 所示)。

表2 研究文献的学科分布

序号	学科分布	篇数	序号	学科分布	篇数
1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115	6	马克思主义	3
2	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	94	7	互联网技术	3
3	新闻与传媒	36	8	社会学及统计学	2
4	政治学	9	9	伦理学	2
5	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	8	10	哲学	1

可见，从学科分布来看，研究文献呈现出集中与分散并存的特点。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115篇）、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94篇）、新闻与传媒（36篇）这三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集中体现了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研究在政治治理、行政管理实践以及信息传播影响等方面的核心聚焦。而其余学科如政治学、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马克思主义、互联网技术、社会学及统计学、伦理学、哲学等，篇数均为个位数，虽涉及理论支撑、技术关联、社会统计分析等多元视角，但在研究规模上相对较小，共同构成了该研究领域的补充性学术拼图，展现出研究在多学科交叉层面的拓展，却未形成如前三学科般的显著聚集效应。

1.3 高被引文献情况

通过对研究样本的被引用量进行排名，最终得到了10篇高被引文献。表3展现了这10篇文献的引用次数、发表年份、作者、标题以及来源期刊等信息。

表3 排名前10位的高被引文献

序号	Title-题名	Author-作者	Source-文献来源	PubTime-发表时间	被引
1	政民互动行为如何影响网络问政效果？——基于“问政泸州”的大数据探索与推论	沙勇忠、王峥嵘、詹建	公共管理学报	2019-04-20	113
2	城市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网络参与	魏娜、袁博	中国行政管理	2009-03-01	113
3	公民网络参与的政府创新分析——以湖南“献计献策”活动为例	徐家良、万方	中国行政管理	2008-04-01	98
4	网络环境下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问题与对策	盛馨莲	东南学术	2007-07-01	80
5	网络公民参与：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框架	周恩毅、胡金荣	中国行政管理	2014-11-01	77
6	公民网络参与：新政治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	尹冬华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0-03-15	61
7	公众对环境保护的网络参与研究——以PX项目的网络舆论演化为例	李丁、张华静、刘怡君	中国行政管理	2015-01-01	54
8	网络征求民意法治化——探寻公民有效网络政治参与的分析框架	杨福忠	政治与法律	2012-02-05	54
9	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与公民参与分析及对策	韩兆柱、王磊	人大研究	2006-01-15	50
10	网络环境下公民有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问题思考	万朝珠	探索	2008-04-15	37

2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主要研究领域

2.1 公民网络参与政策制定的价值意义

信息技术的迭代发展为公民参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相较于传统参与模式，网络平台凭借其开放性、匿名性和便捷性特征，显著降低了参与的时间成本与心理门槛，构建了“降低参与成本-拓展参与渠道”

的双重优势体系[9]。这种技术赋能在协商民主领域尤为显著，李占乐和赵浩的研究特别指出，互联网中的网络舆论传播构成了网络协商民主的实践途径[5]，而大数据技术加速了网络协商民主进程，区块链技术则有助于构建新型信任体系，这些技术进步共同推动着网络协商民主的实现。

从政治发展视角看，网络参与的价值超越工具层面，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深层民主培育功能。赵一璇基于红色文化视角的研究揭示，网络政治参与通过直接性、多样性和平等性特征[10]，不仅激活公民政治参与热情，更在互动过程中形塑公民身份认同，推动被动接受向主动建构的政治人格转型。这种参与文化的培育，为民主素养提升奠定了实践基础，使网络空间成为现代公民意识觉醒的重要场域。

在政策实践维度，网络参与通过重塑信息流动模式提升治理效能。沙勇忠的实证研究表明，政府主导的网络平台有效打破传统参与壁垒，通过整合政策解读、民意征集、互动反馈等功能模块，构建起“公众输入—政府响应—多元协作”的政治生态，显著增强了公共政策的民意嵌入度[11]。王法硕的研究进一步显示，网络政治参与通过提升政治获得感，形成“信息获取—情感认同—行为转化”的传导机制，最终强化了政府信任与治理合法性[12]。

这些研究共同揭示，网络参与通过技术赋能、文化培育、机制创新三重路径，构建起新时代公民与政府互动的新型治理图景——既以技术优势降低参与门槛，又以民主实践提升治理韧性，更以跨领域协作拓展公共事务的解决空间，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创新路径[13, 14]。

2.2 公民网络参与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并非自发形成的过程，而是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影响公民网络参与的主要因素可分为个体层面、技术层面和制度环境层面三大类。

在微观个体层面，李占乐和魏楠通过权重分析和元分析对62篇文献进行量化整合，识别出对网络政治参与具有良好解释效力的六个关键变量：“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社会影响、政府信任、平台信任以及政治效能感”[15]。其中，政治效能感的影响虽未通过失效安全系数检验。这一发现与朱永涵和王睿的研究相互印证，后者同样强调资源条件、政治兴趣等主观因素的关键作用，而非政治认知等客观因素[7]。这些研究表明，公民个体的主观感知和心理因素是驱动其网络参与行为的内在动力。

中观层面，技术因素则形成双重作用机制：一方面，数字鸿沟导致参与机会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平台设计和媒介素养又影响着参与质量。黄大熹在分析“互联网+”背景下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现状时指出，“数字鸿沟”是导致参与不平等的重要原因[16]。王喆和韩广富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技术环境对参与行为的形塑作用，他们发现公民媒介素养不足导致网络参与低效化，而复杂的舆论环境干扰了公民的理性网络参与[8]。这些研究共同表明，技术条件既是网络参与的前提，也可能成为限制参与质量的瓶颈。

在宏观层面，大量研究关注了法律规范和政府回应机制的影响。当前网络参与的法治建设仍面临主体界定模糊、执法标准不一等系统性困境，更为根本的是，政府回应机制的完善程度直接决定了网络参与的实效性[17, 18]。杨福忠在研究中指出系统分析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律规制面临的“主体困境、立法困境、执法困境、守法困境、制度困境”[19]，强调健全网络法治对规范参与秩序的重要性。

2.3 公民网络参与对政策制定的双重效应

公民网络参与对政策制定双重性主要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首先，网络参与重构了政策议程的公共性基础。黄森阐释道，网络的开放与快捷、匿名与平等、直接与多样的特点，有效消解了传统参与中的地理限制和社会身份区隔，使得群体利益诉求能够突破既有表达渠道的束缚[20]。这种技术赋权不仅扩大了政策制定的参与主体范围，更通过实时互动的民意汇聚机制，形成更具代表性的社会共识。

其次，网络空间催生了多元化的参与模式创新。社交媒体、政务平台与网络论坛的协同作用，推动参与方式从单向建言向多中心协商演进。蒋良竹和杨守涛从政策民主角度指出，网络参与贯穿政策议程设定和方案形成的全过程，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决策[21]，这种动态化的参与生态既拓展了政策议题的覆盖面，又通过算法推送和热点聚合强化了民意的影响力，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持续更新的社会感知图谱。

然而，网络参与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和负面效应。首当其冲的是参与的非理性和无序性问题。覃蔺蔚指出，由于公民参与素质及能力不足，在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非理性和无序性等行为[22]。羊许益等

人也发现，网络参与中存在公民参与权利与公共政策权力的互斥性困境[23]。当技术赋能突破传统参与壁垒时，若缺乏有效的议题筛选和共识整合机制，可能导致信息过载与讨论失焦。

2.4 公民网络参与政策制定的现存问题

2.4.1 技术赋能的双重性：效率提升与异化风险

信息技术虽为公民参与提供了便捷渠道，但其技术属性本身亦衍生出异化风险。一方面，万朝珠指出网络环境加大了政策制定参与主体间的不平等，数字鸿沟导致参与主体结构失衡[24]。区域经济差异与个体数字素养差异使部分群体被排除在网络协商体系外，形成“数字弱势群体”，导致民意代表性失真。另一方面，技术工具可能加剧非理性行为。丁宇研究发现，算法推荐机制易形成“信息茧房”，强化群体极化现象[25]，这与张宇早期提出的“离散民意黏性”困境形成呼应[2]。此外，区块链等新兴技术虽被寄予构建信任体系的期望，但其去中心化特性与公共政策的权威性之间尚未形成有效衔接。技术的高效性与民主价值的包容性如何平衡，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4.2 制度供给的滞后性：规范缺失与执行乏力

技术发展往往快于制度调整，现有研究普遍揭示制度性保障的薄弱性。其一，法律规制存在结构性缺陷。尽管我国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规，但其侧重点在于风险防控，而非明确公民参与的权责边界。这种制度空白使得网络参与容易陷入无序状态，例如虚假信息传播或恶意舆论操控等问题难以有效遏制[26]。

其二，政府回应机制呈现碎片化特征。周伟指出目前政府组织以职能为根据的部门分割管理方式，造成政府之间、部门之间信息传递速度迟缓和信息共享困难[27]。孟天广和李峰提出政府回应性是探索政治制度之本质的重要路径，当前许多地方政府虽然建立了网络问政平台，但反馈效率低下，超过半数的地方政府网络问政平台存在“重形式轻反馈”倾向[28]。这种“重形式轻实质”的现象导致公民参与热情受挫，形成“参与疲劳”。更关键的是，政策制定者与网络民意之间缺乏制度化的互动渠道，使得公民意见难以真正影响决策导致“跨领域障碍”持续存在[29, 30]。这种脱节不仅降低了政策合法性，还可能加剧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2.4.3 参与主体的局限性：能力不足与行为失范

公民自身素质是形塑网络参与质量的核心变量，其局限性集中体现为参与行为的非理性倾向与能力体系的结构性失衡。具体表现为：其一，情绪化表达显著制约参与理性。施峰桥指出，互联网的虚拟性与交互性特征使得部分公众易于在网络空间宣泄情绪，甚至通过非理性话语煽动舆论压力，形成对政府决策的情感化倒逼，导致公共政策讨论偏离理性协商轨道[31]。其二，功利性失真干扰政策议程的公共性。陈酉观察到，匿名性网络环境为部分参与者虚构利益诉求、操纵舆论导向提供了技术可能，这类策略性表达通过制造话题热度影响政策注意力分配，致使无序参与问题显著[32]。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公民参与能力的发育滞后于技术赋权的速度。当前政策文本的“技术化表达”与公民政策认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断层，部分公众难以准确解析政策术语、理解决策逻辑，导致其利益诉求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政策输入[33]。霍海燕进一步揭示，这种能力鸿沟在政策议程设立环节引发“代表性偏狭”问题，即弱势参与主体因信息获取能力不足、话语资源匮乏，其利益诉求易被优势群体的话语霸权所遮蔽，致使政策问题的筛选与界定过度依赖局部民意，最终引发政策制定的代表性偏差与公共价值偏离[34]。

2.5 公民网络参与政策制定的优化路径

2.5.1 政府层面

国内学界针对公民网络参与政策制定的制度性困境，形成了层次化的优化路径研究体系。何满熊深入解释了政治参与制度化理论，为网络时代参与治理提供了关键指引——针对当前政策议程吸纳机制结构性缺陷、政府回应滞后、法律规制模糊等制度短板，研究者从顶层设计与操作实施双重维度构建对策体系[35]。

在顶层制度建构层面，戴均和许文强提出的包容性利益整合理念成为核心思路，即通过专项立法确立网络民意在公共决策中的法定地位，将公民意见纳入政策议程刚性程序，从法律层面杜绝选择性吸纳导致的参

与失衡[36]。同步构建覆盖主要利益群体的政策议程准入机制,确保不同阶层诉求通过规范化渠道进入审议流程。

在操作实施层面,王余生的“政府-平台-公众”协同治理模型提供了实践路径;建立政策议程设置的回应机制优化与平台设施规范化建设[37],细化网络民意收集、筛选与反馈的标准化流程,明确三方权责边界,推进政策制定动态公开机制,实时反馈民意处理进度,增强公众参与效能感,破解治理碎片化问题。

2.5.2 网络平台层面

学界针对网络平台在公民参与政策制定中的基础作用,从技术支撑与制度规范双维度提出系统性优化对策。

在技术支撑层面,窦正斌指出,信息时代公民网络参与虽通过多元信息输入弥补了传统决策的信息盲区,但海量信息的复杂性也导致决策者面临“信息过载”困境,亟须构建现代化信息收集系统以提升决策效能[38]。这一系统的有效运行依赖强劲的技术支撑:一方面,政府需强化体制内技术人才储备,建立专业化的数据采集、清洗与分析团队;另一方面,应突破单一主体建设模式,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引入第三方技术机构。

在制度规范层面,陈运熊强调,线上参与与本质是线下政治参与的数字化延伸,需遵循与线下一致的法治原则[39],针对当前网络参与法规空白,研究提出三项制度化对策:首先是明确政务平台的功能定位、信息公开标准及回应时效;其次是界定合理参与边界,规制虚假信息传播、恶意刷屏等失序行为;三是建立第三方平台准入与监管制度,规范其数据采集、使用及安全保护义务。

2.5.3 公民层面

针对公民网络素养不足导致的非理性参与及参与普及度低等治理难点,学界形成以“参与主体培育”为核心的系统性优化路径。王海涛明确提出,提升公民数字素质、培育成熟的网络参与主体,是破解参与效能困境的关键[40]。这一论断与马小娟的研究形成理论呼应,后者从参与文化培育、数字技能提升、参与包容性拓展三个维度[41],构建了系统性的素养提升框架。具体而言,马小娟认为优化公民网络参与公共决策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应通过公共传播与教育干预,引导公民树立责任意识与理性参与文化,培育理性参与文化。二是要提高公民的数字素养,针对数字技能鸿沟,需建立分层分类的培训体系,有针对性地加强网络技术应用专门培训,提高公民的网络使用技能。三是扩大公民网络参与政策制定的参与普及度,加强网络信息无障碍建设,使有视觉障碍、听觉障碍、肢体障碍的公民或老年人都能够无差别地具有使用网络和获取信息的机会[42]。

3 总结与展望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作为数字时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实践,通过技术赋权重构了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模式,为政策科学化与合法化提供了新路径[42]。本文通过系统性文献梳理,揭示了公民网络参与的核心价值、多维影响因素及其双重效应,并深入剖析了当前面临的制度、技术与主体性挑战。研究表明,公民网络参与在拓展政策协商空间、提升政策回应性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也存在着技术负能、制度滞后、参与失衡等深层困境,呼吁构建“技术支撑-制度规范-文化培育”的协同机制。随着数字治理的深入发展,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研究需紧扣数治化转型趋势,可尝试从以下层面展开探究:

一是公民数字参与的制度与机制构建。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制度完善,可以从构建包含参与流程标准化、权利义务法定化、回应机制制度化、效能评估科学化的规范体系入手,以此破解当前公民网络参与政策制定中存在的参与无序、回应虚化、效能不足等治理困境,推动网络参与模式从碎片化、非制度化样态向系统化、规范化的轨道转型[43]。在制度框架构建层面,应重点研究如何通过专门立法明确公民参与的权利义务、议题范围和操作流程,建立从议题筛选、资格审核到意见处理的全流程标准化规则,从法律层面解决参与无序和权责不清的问题[44]。在机制运行方面,应深入探索如何通过技术手段(如区块链存证)实现参与流程透明化,建立“民意收集-分类处理-政策转化-结果反馈”的完整互动闭环,确保公民能跟踪意见处理

过程、政府回应应有明确制度约束。在效能评估方面，可以构建包含参与规范性、政府回应效率、政策转化效果的科学评估体系，结合主客观数据对制度运行效果进行量化分析，为制度优化提供依据。

二是公民数字参与的技术赋能与工具创新。面对技术应用带来的参与质量不均衡、数据鸿沟扩大等治理挑战，可依托数字治理转型推进三类技术工具创新，系统性提升公民网络参与的规范性与实效性。在前端参与环节，需研究如何通过智能技术将民众零散的意见转化为规范的政策建议，并优化交互界面以适应不同数字技能群体，解决技术操作门槛高、民意转化效率低的问题。中端协商环节，应聚焦区块链等分布式技术的治理应用，探索建立身份可追溯、过程全记录的透明协商机制，抑制非理性表达，提升协商过程的公信力和规范性。后端决策阶段，需关注政策模拟数字孪生系统的开发，通过整合多维度数据构建可视化决策模型，让公民在低技术门槛下直观体验政策调整的实际影响，促进其理解决策约束、参与政策逻辑优化[45]。从“网络问政”到“数字共治”，公民网络参与的深化发展既依赖技术创新，更需要制度与文化的协同演进。未来研究应立足中国治理实践，聚焦数治化转型中的真问题，推动技术赋能与民主价值的深度融合，为构建包容性、高效能的公民参与体系提供学理支撑，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迈向新台阶。

三是数字公民培育与参与能力建设。数字时代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依赖公民在技术操作、信息处理及协商共治等维度的复合能力支撑。强化数字公民培育，需突破单一的技术工具的框架，构建涵盖基本能力筑基、核心素养培育的立体化培育体系，推动公民从数字技术的被动使用者向政策制定的主动参与者转型[46]。在基础能力建设层面，应聚焦需求导向的数字赋能机制研究，探索如何通过标准化指引开发与适众化技术界面改造，解决数字弱势群体的技术接入壁垒问题，推动公民从被动使用技术向主动运用工具参与政策转化。在核心素养培育领域，需深化信息理性与协商能力的协同培育研究，构建政策信息解析框架与数字协商实践场景的融合机制，探索依托案例解析、模拟参与等方法提升公民政策理解与互动共识能力的有效路径[47]。实践层面则要突破单一主体局限，重点研究政府、高校、社会组织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包括政府制度供给与平台标准化建设、高校跨学科课程体系开发、社会组织基层辅导机制创新等，形成技术支撑、知识赋能、实践指引的立体化培育体系。

总体而言，数字公民培育研究需超越零散化措施，转向系统性能力建设框架，通过理论整合与机制创新，为提升公民网络参与政策制定的有效性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主体发展方案。

参考文献

- [1] 霍海燕, 高荣. 论网络公共领域对政策议程的影响[J]. 长白学刊, 2015(6): 76-81.
- [2] 张宇. 网络媒体: 公民政策参与有序性增量的新载体[J]. 党政研究, 2015(5): 102-107.
- [3] 石杰琳, 李贤. 国内网络公民参与“制度化”研究述评[J].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3(4): 49-56.
- [4] 赵战军.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反思与优化研究[J].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6(1): 120-125.
- [5] 李占乐, 赵浩. 信息技术视角下网络协商民主的可能、挑战及应对[J]. 理论导刊, 2022(5): 45-50.
- [6] 王明生, 马维振.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与法律规制面临的困境与出路[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0(5): 120-125.
- [7] 朱永涵, 王睿.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政治参与影响要素的实证研究[J]. 情报杂志, 2020(4): 78-85.
- [8] 王喆, 韩广富. 新媒体时代公民网络参与的引导理路分析[J]. 行政论坛, 2019(11): 112-117.
- [9] 张世昌. 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治理中公众参与的困境与完善[J]. 新疆社会科学, 2023(1): 128-136, 146.
- [10] 赵一璇. 红色文化视角下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现状与对策[J]. 中国军转民, 2024(23): 105-107.
- [11] 沙勇忠, 王峥嵘, 詹建. 政民互动行为如何影响网络问政效果? ——基于“问政泸州”的大数据探索与推论[J]. 公共管理学报, 2019, 16(2): 15-27, 169.
- [12] 王法硕.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2.
- [13] 李志, 兰庆庆. 公民网络政策参与的制度化沟通及其实现路径[J]. 中国行政管理, 2016(6): 89-93.

- [14] 李丁, 张华静, 刘怡君. 公众对环境保护的网络参与研究——以PX项目的网络舆论演化为例[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1): 68-72.
- [15] 李占乐, 魏楠. 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的量化整合[J]. 公共管理评论, 2020(8): 102-115.
- [16] 黄大焘, 邹娉婷, 莫桑梓. 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网络参与困境探究[J].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13(5): 76-80.
- [17] 盛馨莲. 网络环境下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问题与对策[J]. 东南学术, 2007(4): 45-50.
- [18] 徐晓雯, 曹守新. 网络问政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J]. 山东社会科学, 2015(6): 67-72.
- [19] 杨福忠. 网络征求民意法治化——探寻公民有效网络政治参与的分析框架[J]. 政治与法律, 2012(2): 84-96.
- [20] 黄森.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论析[J]. 宁夏党校学报, 2017, 19(4): 52-55.
- [21] 蒋良竹, 杨守涛. 政策民主语境下的公民网络参与政策制定研究[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20(5): 50-55.
- [22] 覃藟蔚.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网络参与困境研究[J]. 中国国际财经(中英文), 2017(11): 152-153.
- [23] 羊许益. 网络环境下的公共政策: 政治参与的视角[J]. 社科纵横, 2018(3): 89-92.
- [24] 万朝珠. 网络环境下公民有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问题思考[J]. 探索, 2008(2): 66-68.
- [25] 丁宇, 姜丹. 公民网络问责背景下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困境及其对策[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19(11): 132-137.
- [26] 孙淑秋.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研究述评[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5(12): 19-23.
- [27] 周伟.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回应困境与消解路径[J]. 情报杂志, 2018, 37(4): 100-105+99.
- [28] 孟天广, 李锋. 网络空间的政治互动: 公民诉求与政府回应性——基于全国性网络问政平台的大数据分析[J]. 清华大学学报, 2015, 30(3): 17-29.
- [29] 吴勇, 孙常程. 网络公民参与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09, 29(8): 43-46.
- [30] 周恩毅, 胡金荣. 网络公民参与: 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框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4(11): 100-103.
- [31] 施锋娇. 自媒体情境下公民网络政策参与的机遇与挑战[J]. 中国行政管理, 2019(9): 112-115.
- [32] 陈西. “互联网+”背景下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网络参与研究[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8(8): 55-58.
- [33] 俞怀宁, 俞秋阳. 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形式、特点及其政治影响[J]. 社会主义研究, 2011(5): 76-79.
- [34] 时伟. 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困境及有效引导[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20(5): 88-93.
- [35] 何满雄.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的路径探析[J]. 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 2013, 15(2): 56-57.
- [36] 戴均, 徐文强.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探究——基于有序性兼有效性二维结构的视角[J]. 社会主义研究, 2017(3): 103-109.
- [37] 王余生.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网络民意应用: 逻辑、困境与策略[J].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16(5): 48-53.
- [38] 窦正斌, 李义. 网络环境下完善公共决策供给机制的对策探讨[J].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2018(8): 45-50.
- [39] 陈运雄, 罗甜甜.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趋向及其原因分析[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6, 18(3): 1-4.
- [40] 王海涛.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性研究[J]. 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2013(4): 67-70.
- [41] 马小娟.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决策的价值、风险及优化策略[J]. 理论探索, 2014(6): 97-101.
- [42] 周东林, 张庆胜. 论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的利弊[J]. 企业经济, 2010(11): 141-143.
- [43] 邱雨. 网络公共领域的政府参与和建构: 历史源流与类型分析[J]. 求实, 2025(2): 28-40, 110.
- [44] 赵静. 我国公民网络参与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及对策[J]. 现代营销, 2018(11): 34-37.
- [45] 赵金旭, 伍诗瑜, 郑珍珍. 公民网络参与的文献综述——基于CiteSpace的图谱量化分析[J]. 数字治理评论, 2017(0): 125-146.
- [46] 徐家良, 万方. 公民网络参与的政府创新分析——以湖南“献计献策”活动为例[J]. 中国行政管理, 2008(4): 70-74.
- [47] 李丁, 张华静, 刘怡君. 公众对环境保护的网络参与研究——以PX项目的网络舆论演化为例[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1): 68-72.